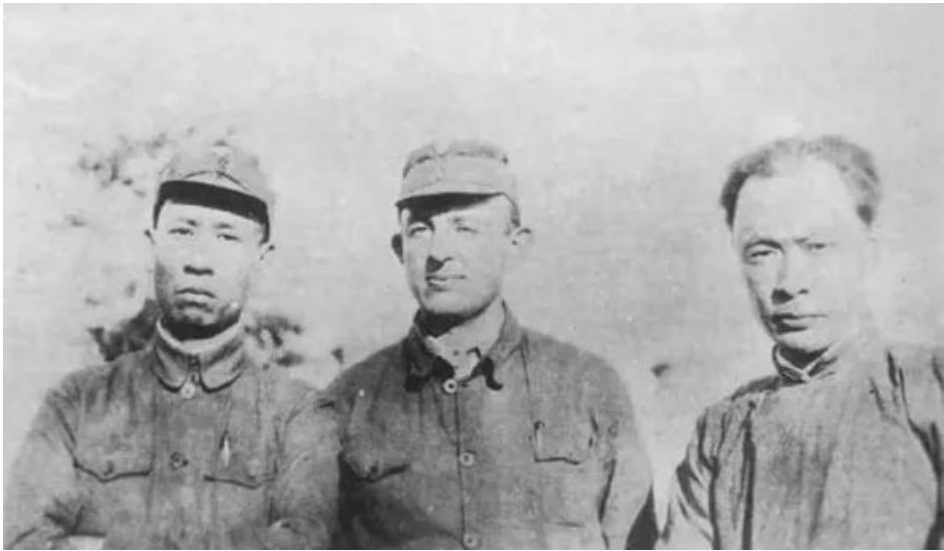


全面抗战时期,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频繁的作战任务以及流行病的威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医疗卫生体系。从1938年新四军军部军医处的成立,到逐步构建覆盖全军的医疗网络,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蓬勃发展。一支由专业医生带领、在战火中不断学习的医务人员队伍,克服物资匮乏、条件简陋的重重挑战,不仅显著提升了部队的医疗保障水平,也得到国际观察家的广泛赞誉。

国际观察家眼中的新四军医疗卫生工作

□ 丁怡丹



刘少奇、罗生特、陈毅(从左至右)在新四军合影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普遍面临武器装备落后、生存条件艰难等困境。新四军在华中战场也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频繁作战的情况,加之流行病普遍,亟须加强卫生工作。为此,1938年2月下旬,新四军正式成立军医处,随后逐渐组建各支队的军医系统组织和军部前后方医院,医务人员克服各种困难,努力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有效保证了新四军的战斗力,受到国际观察家的关注。

坚持在战火中不断学习

新四军重视卫生工作的开展,军长叶挺曾与军医处处长沈其震一起物色医务人员。新四军的卫生工作是在有经验的医生指导下开展的。军医处处长沈其震,副处长戴济民、医务主任宫乃泉等人均于医学院毕业。德国记者汉斯·希伯

还介绍奥地利医学博士、泌尿科专家罗生特到新四军工作。希伯认为新四军的医务处是在“现代有经验的中国医生的指导之下”工作。部分国际观察家对新四军的医务人员有过记录,高度评价他们的专业素养。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认为沈其震是“一个了不得的科学家,完善的组织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称其“有高深的医学修养”。罗生特观察到,宫乃泉“每天差不多要工作20个小时,白天是行政工作、动手术、给病人做检查、在进修班和医学大学作讲座、视察医院和前线,夜里则翻译英文的医学文献”,有“钢铁般的毅力”。

新四军医务人员坚持在战火中不断学习,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史沫特莱看到新四军的后方医院里有一个医学图书室,用于“了解医学领域内的最新发现”,医务人员“贪婪地学习《英国医学杂志》上所刊载的西班牙共和军医师们的经

验”,还“撰写和出版袖珍本的医疗手册,并把它们散发给前线的医护工作人员”。1941年,罗生特来到新四军,在给伤员进行摘除膀胱结石的手术时,所有不值班的医生都围在一旁观看,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勤奋和兴趣”。罗生特还观察到,新四军中较为年长的医生通过参加转岗培训班等方式使自己的“医学知识现代化”,以“不懈的勤奋努力弥补了不足”;新来的大学生则通过与“谦虚、勤奋、久经战斗考验的老同志、有经验的医疗骨干们的紧密接触”,“很快就具备了在前线工作的能力”。

新四军注重培训医务技术人员。军部军医处组建后,开设6期医务干部训练班和1期化验训练班,共培训208人。1941年,新四军重建军部后,先后开办华中卫生学校、华中医学院和新四军军医学校。至抗战结束,新四军共培训各类医务技术干部万余名。国际观察家注意到这一点。罗生特认为自己“和其他几位有学历的医生和护士所能做的一切,是通过学校和重复办的培训班,使普遍的医疗水平逐步得以现代化”。加拿大护士琼·尤恩也记录到,新四军“常常召开工作人员大会”,讨论如何及从何处可以获得所需,“使医务和培训的工作得以进行下去”。

“制造一切自己能制造的东西”

全面抗战时期,新四军作战频繁,但长期面临资金匮乏及国民党、日军的双重封锁,药物购买和储备受限,制约了战斗力的提升。1939年6月22日,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强调要“保证我军物质供给之自立而不依靠他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四军尽力改善情况,取得一定成效。国际观察家看到这一点,对此有相关记录。

新四军医疗条件艰苦,物质条件困难。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看到医院设立在“风吹雨打的破庙里”,病床是用“一块木板支起来”的,化验室设立在茅屋里。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新四军卫生

部门与医务人员充分发扬革命和创造精神。新四军后方医院院长崔义田认为,“医护人员都以忘我的热情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国际观察家看到医疗工作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制造一切自己能制造的东西”。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看到新四军为了节省资金,“花了三十块钱做了一个孵卵器”来“研究微菌”,如果从“外面购入,至少要花二百元”。琼·尤恩也观察到,新四军“后方医院缺乏器材”,医护人员“就地取材,制造医用陶器”。斯诺看到新四军“穷到无以购置外科手术用具,只好由他们自己的工厂制造钳子、剪刀和解剖刀”。除了上述医用器材外,新四军还会自制药品。比如“用蜡豆、猪油和硫磺调成”凡士林的“代用品”,以及“用蜡和猪油拌和起来,然后加上硫磺”来医治疥癣。

新四军的卫生部门和医务人员重视卫生保健工作和火线救护工作。新四军中有疟疾、痢疾、肺结核、肠道传染病、疥疮等传染病、多发病,以“无病预防、有病早治”为卫生保健工作的指导思想。贝尔登看到“病院的墙壁贴了许多教病人如何卫生的标语”。史沫特莱高兴地指出,第一次在中国看到“有科学设备的厨房”,“干干净净,一切东西都是被消过毒的”,墙上还写着“注重清洁”。厕所“粉饰得洁白”,“自由的洒着石灰以保持其卫生”。罗生特与新四军的医疗工作者“讨论了如何防治疥疮、沙眼的问题”。他发现在前线工作的医务人员需要检查士兵的个人卫生,包括“洗涤、洗澡、剪指甲、刷牙”,采取“对公共卫生状况的预防措施”,包括“对公共厕所、厨房、卧室进行检查,针对霍乱、伤寒、天花和其他可预防性疾病进行接种工作”。

火线救护是战时卫生工作的首要任务。1940年11月,新四军军医处在《保健员的三大任务》中强调,火线急救“应当很机警的找寻伤员,沉着地检查伤口,敏捷地敷药与包扎,态度要安详,不可出现半点慌张”。到1941年,多数部队的卫生员“能在较复杂地形条件下寻找伤员,在

炮火中搬运伤员”。在火线救护中,出现了黄钟、张峰居、吴克胜等英雄模范人物。斯诺观察到医务人员“除携带药袋之外,还带着枪支,有时且同兵士一同战斗”,在战场施行急救并把伤员送至安全的后方。

“建成了一支有万余名医务人员的队伍”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新四军的卫生工作取得显著进步,医疗条件有效改善。数据显示,全面抗战时期,新四军“建成了一支有万余名医务人员的队伍”,建立近百所医院、医疗所,共救治8.5万余名伤员。其中,军部在皖南的3年中,前后方医院收治6000余名住院病人,手术1443人次,治愈或好转率达82.9%。

国际观察家们毫不吝啬对新四军卫生工作的赞誉,尽管部分评价有夸张的色彩,但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新四军卫生工作的成效。贝尔登认为新四军的设备和服务比他“在本次战争中所见到的任何师的或军的医院都要好得多”。希伯赞扬新四军的医务处“是中国一切军队的模范”。爱泼斯坦认为,“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一批富有献身精神的医生创建了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军事医疗服务系统。”史沫特莱认为新四军的医院是“中国军队中现代医务工作的最早开端”,尤其是医药服务处“真是这军内一个最漂亮的组织”,“在后方的这个伤兵总医务处有第一流的实验室和最漂亮的手术室”。美国学者杰·霍利德也记录下,“新四军的医院和医疗设施被认为是新四军的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新四军卫生工作的成功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的缩影。国际观察家由此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命运更加充满信心,认为“这里在前线是光明不是黑暗,在炮火下,在日本飞机的阴影下,中国的科学家正在朝着建设新中国的前途大踏步的迈进”。

月份牌创作的黄金时代

□ 朱少伟

月份牌创作名家辈出

在高剑父的鼓励下,郑曼陀成功运用立体感强、色彩明丽的擦笔水彩画法,使月份牌创作迎来一个飞跃。

与郑曼陀齐名的月份牌画家,有周柏生、徐咏青、丁云先、倪耕野等;郑曼陀与徐咏青合绘的作品(前者画人,后者画景),曾有“合璧”之誉。在他们笔下,月份牌的“主角”开始从旧仕女画向新时装美女画转变,一些作品也逐渐淡化广告和年历功能。

当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图画部是月份牌画家的一个摇篮,徐咏青曾主持工作;这里的学生,如杭稚英、何逸梅、金梅生、金雪尘、戈湘岚等,受民间美术传统的影响较少,而受西洋画派、卡通电影等影响较多,他们曾模拟郑曼陀,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最终均成月份牌创作后起之秀。其中,出类拔萃者为杭稚英,他在馆内打下“七年之基”(3年习艺,4年服务),至1921年就独立创办“稚英画室”,并请何逸梅、金雪尘、李慕白等加盟。

1921年,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与实力雄厚的外商竞争,邀集申城12位月份牌创作名家精心绘成《沉香亭北倚栏杆》《斜倚熏炉坐到明》《新花低发上林枝》《三月三日天气新》《枝

上柳绵吹又少》《云水沉沉夏亦寒》《红裙忌煞石榴花》《湖上微风入槛凉》《霜落秋山黄叶深》《已凉天气未凉时》《玉为风骨雪为衣》《调急遥怜玉指寒》,印制《十二名画集》用作促销赠品,这应属最早的挂历;参与此项目者除了郑曼陀、周柏生、徐咏青、丁云先、谢之光等,杭稚英作为崭露头角的新秀也跻身于中间,他的《新花低发上林枝》,描绘一位手持网球拍的佳丽,被时人誉为“空前绝后之美术品”。

“稚英画室”成员先后共有20余人,承接订稿多为画室成员集体创作,每年出品达80余种;所推出的月份牌虽多呈现时装美女形象,却也生动反映女子参与的校园活动、慈善义举,以及她们骑摩托车、打高尔夫球、游泳、赛马、划船等,从一个侧面折射上海的摩登风情,深受市场欢迎。因而,蒋燕燕在《我的外公郑曼陀》中说:“外公是擦笔炭精粉画第一人,也是擦笔水彩画第一人,他画的广告画、月份牌用的就是擦笔水彩画法,在当年颇受广告界推崇和老百姓的喜爱。当时除了外公,没有人会用这种画法作画”,“有些人专门模仿他的画法,倾心研究”,“学会了擦笔水彩画的技巧,组成工作室,以工业生产的方式流水作业,比他画得快,比他画得多,比他画得时尚,比他画的画价格便宜”。“稚英画室”的异军突起,显然与月份牌迈向鼎盛紧密相连。



杭稚英等合绘《木兰还乡图》

月份牌滥觞于晚清上海,它贯通中西绘画技法,为海派文化之象征符号。清末黄振麟的《沪江商业市景词·月份牌》说:“中西合历制成牌,绘得精工异样佳;分送频年交往户,藉招生意贺同侪。”辛亥革命后,公历在我国广泛推行,这对月份牌的升华产生深刻影响。

孙中山伟人风采亮相月份牌

1876年1月3日,《申报》登载上海洋商海利号出售“华英月份牌”广告,此系其名称首次出现于报纸。数年后,该报率先印制月份牌“随报分送”,并介绍“此牌格外加工,字分红绿二色,华历红字,西历绿字,相间成文。华历二十四节气分列于每月之下,西人礼拜日亦挨准注行间”,“系中西合历,用洁白洋纸印成,印就戏剧十二出,各按地支生肖寓意,皆系名人手笔”。现存最早的月份牌,为1889年初推出的《申报馆印送中西月份牌·二十四孝图》问世,上有“光绪十五年岁次己丑”和“西历一千八百八十九年至八百九十年”字样,由红绿双色套印,红色部分为中西对照的月历,“二十四孝图”环绕,兼具广告功能和年历用途。月份牌作为我国年画的后起之秀,不仅受到一般市民青睐,也为知识阶层所关注,如张元济于1910年春节期间写信问候在德国留学的蔡元培,特意“寄上月份牌十份,并乞分致同人为祷”。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启历史新纪元;翌日,发布《改历改元通电》,确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按即公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十年十一月十三日(按即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随着这项历法改革,月份牌作为普遍推

广公历的最佳视觉载体和文化媒介,因宣传性、欣赏性、实用性强而迅速兴起,风行一时。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上海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由席豫福、傅子濂等创办,自建印刷厂和发行所,沈恩孚担任编辑长,专事编辑出版教科书,尤以高小史地教科书最为出名,曾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在教科书营业方面的激烈竞争对手;后上海商务印书馆收购其股票,于1918年进行兼并)闻风而动,立即大量印制《中华民国元年月份牌》,它的中间有孙中山肖像,上标“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字样,下标“中国图书公司谨赠”字样,左右分别印着农历、公历;这张月份牌虽设计简朴,但商铺老板纷纷置于店堂,市民争相带回家中,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与此同时,另一份中华民国月份牌也在沪推出。在这张月份牌中,所分布的12个大字可拼读为“欢迎共和新政 天下同胞一心”,右边的旗帜有“民国军”字样;画面人物比较多,上部左为“民主总统孙汶(文)”(即孙中山)、右为“民国军帅黎元洪”,下部中间是两位辛亥革命元勋、左为徐绍楨、右为黄兴。端详整个画面,不禁令人联想到武昌起义的烽火。

1926年10月10日,上海中国三兴烟公司(1924年创办)在《申报》登载“孙文牌香烟”广告,画面两侧均有孙中山画像,并分别印着“革命尚未成功”和“同志仍需努力”。该公司还曾印制《孙中山》月份牌,描绘民国初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身穿藏青色有金丝肩章的大礼服,戴着白手套的双手杖着指挥刀,雄赳挺立,目光炯炯,若有所思,展现了一代伟人风采。

高剑父推动“改革月份牌”

高剑父为辛亥革命元老,也是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他早年就读于广东水陆师学堂及岭南学堂,后师从居廉;1903年至1907年间,数次东渡日本进修美术,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后奉命返粤组织广东支会并担任会长,参加黄花岗起义和光复广州战役。1912年4月,他与弟弟高奇峰及陈树人在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办起审美书馆;6月,出版《真相画报》(旬刊),系16开铅印本,每期文字、摄影、绘画各占三分之一。《真相画报》“以监督共和政治,调查民生状态,改进社会主义,输入世界知识为宗旨”;“二高一陈”(高剑父、高奇峰、陈树入)还借此申明艺术主张,提出“折衷派”的口号,即“折衷东西,融汇古今”,无疑与海派文化精髓契合。1913年,徐悲鸿来到黄浦江畔谋生,不料

在“十里洋场”陷入困境,他的夫人廖静文回忆:“当时没有舒心的场地可供作画,没有充裕的时间用来构思,经常是饥肠辘辘。悲鸿停在一个卖米饭和油条的小摊前,只买了一个不夹油条的粢饭团,靠着这个粢饭团支撑一天的工作,有时一天连这样的粢饭团也没有,只好断食。”徐悲鸿经朋友介绍,在沪结识高剑父、高奇峰昆仲,应约绘画获取酬金,才得以解燃眉之急。高剑父乐于提携青年才俊,对徐悲鸿为审美书馆画的一幅骏马图,他如此评价:“古之韩干,无以过也。”那时,徐悲鸿受到启发,依托自己的美术功底,用六七天绘成《扑蝶图》《纳凉图》《采菊图》《寒香图》,明显为月份牌形式;四幅反映春夏秋冬镜头的仕女图栩栩如生,审美书馆多次出版发行,销量可观。1918年1月,《复旦》校刊发表署名刘剑夫的诗,对其作点评:“扑蝶图:频领玉腕剧堪怜,小扇轻摇舞欲前。一路苍苔幽径滑,蝶迷人倦艳阳天”;“纳凉图:莲花恰好并头开,秋水凝神费想猜。风过画栏香满袖,月映大吠有人来”;“采菊图:毕竟秋容迥俗群,偶来幽境抱清尘。采得侍向郎前问,悄比黄花瘦几分”;“寒香图:一天风雪探梅魂,腴展声声贱有痕。娇瘦堪怜无个伴,携来小犬最温存”。徐悲鸿是我国现代美术事业奠基者之一和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他早年在高剑父的支持下参与月份牌创作,不仅曾为它的发展助力,也成为画坛的一则佳话。

1914年,画家郑曼陀结识高剑父。此刻,高剑父也关注着月份牌市场趋势,他向郑曼陀交流自己的艺术主张,建议这位画家大胆创新“改革月份牌”,并表示愿鼎力相助;郑曼陀对此很感兴趣,爽快地应允。不久,郑曼陀根据审美书馆的要求,结合在照相馆开画室代客按照片画肖像积累的经验,以首创的特技擦笔水彩画法绘成自己的第一张月份牌《晚妆图》,画中女性面庞白嫩细腻,容光照人;高剑父看后颇为赞赏,他欣然为之题写长跋,称“是图曼陀君十年来得意之作”。郑曼陀绘成月份牌《银塘秋水》时,高剑父又为之题诗:“银塘秋水玉娟娟,霜叶飘红去渺然。几欲题诗寄辽海,只应流水到君边。”目睹郑曼陀的艺术精进,高剑父非常高兴,他曾情不自禁执笔为其作品配景,直接参与月份牌创作。审美书馆则连续出版发行郑曼陀的一大批月份牌新作,据《申报》报道:仅在1915年5月至1917年8月,就出版发行他的《时装爱情画》《美人》《暖香图》《秋思图》《伤春图》《双美晚妆图》《群芳图》《春思图》《消凝图》《惜香图》《折芳图》《嫦娥图》《引凤图》《问菊图》等。从此,郑曼陀在沪声誉鹊起。



1926年的上海商务印书馆